

超越规则的治理：比较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角色

郝唯真

张 华 译*

【摘要】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国的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都积极地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虽然近年已有不少采用多层面、多学科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但大部份还没有对政府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的角色作国际比较和透彻的分析。采用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政府应如何采用一系列的工具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并讨论政府介入的利弊与挑战。同时，也探讨这些国际的经验如何在中国国情下应用。在对公司作规范管制政策的文献基础上，论文指出，政府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政策，能赋予“传统”的公司规制工具更大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明白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就能更好地制定战略，创造一致的激励因素，引导企业作更负责的商业行为。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治理 国际比较 守法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2)02-0120-26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人们对于商业活动对社区、雇员、投资者和环境影响的争论(Bhagwati, 2004; Reich, 2009); 同时，社会也更多地认识到规制企业行为的传统工具的界定、实施和局限性(Blanpain et al., 2007: 8-13; Verdier, 2009)。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以下简称

* 郝唯真(Virginia Harper Ho)，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法学院，副教授；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CSR)运动更具多样性和活力。这一运动,历史上是由顾客、投资者和公民社会团体共同推动的,但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也开始给予高度重视(Mullerat, 2010; McBarnet, 2007; Crane et al., 2008; 黎友焕, 2010)。

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广泛定义为企业承担超出法律要求之外的自愿行为(Zerk, 2006: 30; 黎友焕, 2010: 4-6)。这个定义意味着CSR的行为是超出公共规制范围外的,是私人的独立自主倡议。从这个观点看,政府在CSR中的角色只限于在环境、劳工的和类似的公共福利事业上,为社会制定和执行法规。这些法律和规则可成为建立自发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

然而,规章、政策制定,标准设定和政府对于CSR的促进行动,都能够明显地影响企业进行负责任的商业活动,并强化其对法规的遵守(Fox et al. 2002; Lozano et al., 2008; Potoski & Prakesh, 2009; Peters & Roess, 2010)。另外,包含在CSR议程中的复杂政策问题,比如企业对环境恶化、劳动力供应、就业水平和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需要在传统的“命令和控制”式的政策制定和规制工具之外找出解决方法。

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的10年中引进了许多措施,将鼓励CSR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同时,世界各地出现了更多跨学科领域的CSR研究,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GTZ, 2007; China - Europa Forum, 2010; Moon et al., 2010; Peters et al., 2010)。然而,这些研究对政府在CSR中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仔细的验证,特别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政府的角色,就更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论文采用国际比较的视角,首先对政府在CSR中的角色、政府在CSR中采用的一系列工具,以及政府鼓励CSR的好处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个概括的描述。然后探讨中国政府应如何将这种国际比较的经验引以为鉴。论文也提出哪些经验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基于公司合规和规制政策的文献和研究,论文认为国家对CSR的政策安排,能对传统的企业规制工具的合法性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一联系和CSR在经济上能起到的潜在正面作用,论文认为中国政府应思考不仅从“管制”来约束企业行为,还要制定更多持续的策略,鼓励负责任的商业活动。

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和“超越法律”

通常,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责任(CSR)被广泛定义为公司应如何管理它的业

务,换言之,就是良好的企业公民身份;同时,又指公司对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比如雇员、当地社区和环境(Zerk, 2006: 30 - 31; 刘诚, 2006: 533 - 534; Wang, 2010: 4 - 5)。

在第一种定义中, CSR 包含公司在管理决策中,追随道德和伦理规范,并要积极地影响社会(Frederick, 2008: 524 - 525; 黎友焕, 2010: 48 - 53)。这通常被描述为“超越合规”。第二种定义则强调,一个公司不仅要为其投资者获得财富成就,而且要对其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获取社会、环境和财富成就等三方底线负有责任(所谓的“triple bottom line”)(Zerk, 2006: 31; 黎友焕, 2010: 62 - 68)。论文对这两方面的 CSR 定义都加以肯定和接受。

虽然 CSR 通常被定义为企业超出法律要求之外的商业自发行为,但是遵守法律还是 CSR 的基本要素(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刘诚, 2006: 533 - 534; 黎友焕, 2010: 7; 朱慈蕴, 2009)。例如,由卡罗尔开发的金字塔式层级模式的 CSR 中(Carroll, 1991; 黎友焕, 2010: 7),法律构成金字塔的基础,而企业的慈善事业、伦理和道德标准和企业通过其经营对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所作的贡献则位于金字塔的顶层,从而证明 CSR 是一个更广泛的承诺(Carroll, 1991),不能简单地将自发行为与强制要求分开,也不能将 CSR 的承诺与法规责任相分离(McBarnet, 2007; Zerk, 2006; 朱慈蕴, 2009)。

因此,本研究遵循近期有关 CSR 和法律方面的文献发展,认为两者是相互结合并相互强化的(Trubek & Trubek, 2007; Gunningham, 1998; 朱慈蕴, 2009)。例如,许多自愿的 CSR 实际上是由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顾客或公共压力,和其他替代的机制“强制实施的”(Parker, 2002; Zerk, 2006; Verdier, 2009)。另外, CSR 的很多方面,比如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通常也基于很多法律上的要求(McBarnet, 2007: 31)。由于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发展自愿的 CSR 标准,“硬法律”和“软法律”,或者说“自愿”和“强制的”的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无论是自发的、准自发的或是法律强制要求的,促进遵守法律条文和精神的 CSR 共同活动均包括在论文的研究范围内。

三、企业社会责任和国家:国际比较的视角

从历史上看,政府在开发 CSR 政策中并不充当领导角色,通常只对公共需求、

经济危机以及商业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等的独立创建作出回应 (Aaronson & Reeves, 2002; Lozano, 2008: 29)。然而, 世界各国政府如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 CSR 政策和项目的开发中来。政府推动 CSR, 部分原因是由于认识到政府规制工具的缺乏和单一, 难以处理复杂的公共政策挑战, 并解决企业导致的社会矛盾、环境的恶化和发展带来的问题 (Aaronson & Reeves, 2002; Moon, 2004; 黎友焕, 2010: 69-95)。与此同时, 商业机构往往缺乏能力或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执行 CSR 的工作, 而政府在这些领域却有很好的作用。世界各国政府也同样认识到若要不断地提高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和吸引投资, 它们需要对可持续发展有更大的承担, 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自愿的 CSR 政策也能促进政府进行政策创新和填补政府规制的空缺 (Aaronson & Reeves, 2002; Peters & Roess, 2010)。

对政府在 CSR 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文献认定了几个政策领域焦点(“主题”), 和为促进 CSR 可采用的一系列工具或策略 (Fox et al., 2010; Lozano et al., 2008; GTZ, 2007; Peters & Roess, 2010)。毫无意外地, CSR 内含的“主题”或“聚焦领域”蕴含着广阔的政策范畴, 包括公司治理、慈善事业、社会标准(劳动和就业)、环境标准、责任投资、人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 (Lozano et al., 2008: 34; Fox et al., 2002)。

政府促进 CSR 的努力没有必要遵循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 企业作出回应。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一致认为公共部门在 CSR 中的关键角色包括支持/提升意识、促进、合作、强制性要求 (Fox et al., 2002: 3; Peters, 2010: 16-18)。

①支持/提升意识。政府通过信息宣传、培训和教育项目来支持 CSR, 以及作为市场角色把 CSR 建立到公共采购要求中, 以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

②促进。政府能够通过标准设定和认证系统、审计和监督、建立激励机制、法律来创造支持的环境, 执行多边公约和指导方针来促进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接受 (Fox et al., 2002; Lozano et al., 2008; Peters & Roess, 2010)。

③合作。政府也许在一些特殊项目中直接和企业进行合作, 与国际组织共同推进 CSR, 并协调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 政府和商业是一种双向作用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双方都致力于实践、政策甚至是特殊项目的开发 (Lozano et al., 2008: 37)。在计划、执行和监督 CSR 项目的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也作为商业和政府的伙伴发挥作用 (Fox et al., 2002; Lozano et al., 2008; Peters & Roess, 2010)。因此, 围绕 CSR 议题的

协约变成了政府、商业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间的三方合作 (GTZ, 2007; Lozano et al., 2008: 36-37; 胡鸿高, 2009; 王丹, 2010)。^④强制性要求。政府能通过立法和管理实施的方式指令 CSR。在以上的四个角色中, 唯有指令这一角色在政府和商业间更像传统的角色。

正如表 1 所示, 政府在促进 CSR 的过程中采用的独特工具横跨如通过官方媒体广泛传播关于 CSR 的信息的“软工具”和比如正式立法及强制 CSR 报告义务的“硬方法”两个范畴。

表 1 政府在 CSR 中的角色和工具

政府角色		举例/工具
软工具 ↑ 硬工具	支持/提升意识	确立和提升在 CSR 中有领导角色的公司; CSR 奖励; 通过网站、出版物和公众调查促进 CSR; 在公共采购需求和国家财政政策中引入 CSR 的措施; 提倡 CSR 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一部分; 推广公平贸易标签体系和国际企业社会责任倡议, 比如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全球报告倡议 (GRI)
	促进	提供 CSR 服务和通过公司或公民社会伙伴支持 CSR 倡议; 鼓励分享成功的 CSR 实践; 发展 CSR 的指导方针并为非政府的 CSR 项目提供技术协助; 为自愿 CSR 报告、CSR 绩效和国际 CSR 标准的应用提供激励; 推动 CSR 管理模式、标准、报告、指南和审计体系, 包括责任投资和产品标签的标准化; 通过法律来促进责任投资、环保标准、公平贸易、合理消费、工作—生活平衡、雇员自愿、员工条件、企业透明度, 和反就业歧视; 为有关 CSR 的研究和创新项目提供资金
	合伙	拓展企业有关社会责任的业务网; 商业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公私合伙关系
	强制性要求	指令 CSR 报告或类似行为; 要求把 CSR 放进公司法; 把有关的 CSR 措施采纳到公共采购需求和财政政策中; 建立最低的执行标准和实施机制; 通过法律来执行国际协议和指导方针; 使 CSR 管理模式、标准、报告、指标和审计体系标准化; 命令公开披露有关的社会责任型投资

资料来源: Fox et al. (2002); Lozano et al., (2008): 34-35, 46-49。

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 以及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各有

差异，政府授权的程度、强调的特殊实质性的“主题”和政府促进 CSR 的方式也因应变化 (GTZ, 2007; Visser, 2008; Lozano et al., 2008: 25, 30)。下文将对国内和国际政府如何能更好地扮演 CSR 的角色，作一概括的描述。

(一) 政府在推行 CSR 中的国际化参与

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一系列的多层面合作，建立各种“软法律”工具、多层面的合作实施网络、自愿的或自治的监督体系和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些措施包括联合国跨国公司标准、联合国全球契约和负责任投资原则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新颁布的跨国公司指导原则、联合国 2011 年 6 月正式通过的“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和 ISO26000 社会责任指导标准。这些行动方案都支持和促进了公司对 CSR 的采纳，并且提供了比多方或双边的国际协议更灵活的体制选择。

(二) 欧盟

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政府同样也采用了多种政策和明确规定去促进企业更多自愿地承担社会责任 (Zerk, 2006; Peters & Roess, 2010)。尽管各成员国促进 CSR 的方式多样，但都是根据欧盟关于 CSR 基本主题这一共同愿景而构建的，构画这些基本主题的渠道包括：欧洲委员会的 CSR 绿皮书 (EC, 2001)、CSR 通知 (EC, 2002)、欧洲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CSR 论坛报告 [European Multi-Stakeholder Forum (EMSF), 2004]、CSR 的实施通知 (EC, 2006)，和最近的 2011—2014 欧盟 CSR 更新战略 (EC, 2011)。

欧盟早年的 CSR 行动方案和一系列的公共讨论及政府间谈判，为 CSR 打下了商业导向的“欧洲 CSR 联盟”基础 (EMSF, 2004; Zerk, 2006; Lozano et al., 2008: 51-68)。这些政策的关键原则是 CSR 意识，“这种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通过社会对话得以发展的商业论题” (Lozano et al., 2008: 179)。最新的“欧洲 CSR 更新战略”就是基于以上的努力，意在“增强企业的积极影响——例如通过有利于社会和企业本身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以及减少和

防止消极影响”(EC, 2011)。更新战略的一部分则要求欧盟成员国的企业适应国际标准, 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跨国公司指导准则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标准(EC, 2011)。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自我和互为约束, 增强 CSR 披露, 加强 CSR 培训、教育、研究和落实(EC, 2011)。

以上行动方案得以实施主要基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努力, 但欧盟各国政府历来在促进 CSR 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根据拉扎诺等(Lozano et al., 2008: 42-44)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实践分析, 可以把政府关于 CSR 的行动方法归结为四种模式: 合伙模式、社区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和公民身份模式和希腊广场模式。

1. 合伙模式包括北欧的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挪威^①等采用的方式。

该模式放开了某些在社会福利方面历史上主要属于政府的角色, 创立了一种政府与企业合作开发和实施共同的政策目标的模式(Lozano et al., 2008: 42; Albareda et al., 2008)。中央政府积极使用税收政策和其他刺激措施以激发公司 CSR 的积极性, 这被视为是一种广义的可持续政策的一部分。地方政府也热衷于整合和促进 CSR 行动方案。这样, 基本的国家—社会合伙关系得以建立和不断成熟(GTZ, 2007)。

2. 社区商业模式指的是爱尔兰和英国采用的方式。

在该模式中, 政府促进和协调 CSR 的努力主要是为了支持私人部门和推行政府与商业团体间共同承担责任的思想。英国促进 CSR 的方法源于 20 世纪末对“社会治理危机”的认识, 当时商业被视为潜在的解决办法, 尤其是面对高失业率和经济改革止步不前的挑战(Aaronson & Reeves, 2002; Moon, 2004)时。这种促进 CSR 的综合方法的特征是以“软干预政策”去鼓励公司通过企业家精神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帮助解除社区治理的挑战(Moon, 2004; Lozano et al., 2008: 103), 并且通过大量的公共参与, 使 CSR 得到不断的发展(William & Conley, 2005; Clark & Knight, 2009)。英国政府通过一个由特定的部长级官员领导的独立政府部门来直接指导 CSR 政策(英国商业改革和技术部), 优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和政府在国际、国家以及地方层面的非正式参与(Lozano et al., 2008: 179; Gunningham, 2008)。所以, 英国被广泛认为在世界各国政府中采用了最广泛的、

^① 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

综合的和最多鼓励公民参与的方法来促进 CSR 的发展 (Moon et al., 2010; GTZ, 2007)。

3. 可持续性和公民身份模式指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卢森堡等欧洲大陆国家采用的方式。

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企业公民身份传统，企业、劳工、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织有密切互动 (Aaronson & Reeves, 2002)。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强调可持续发展，鼓励商业积极创造社会资本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承担责任。在这些国家中，尤其是法国，对于可持续性发展采用了更为强硬的管理手段，而较少强调合作性的政策制定 (Lozano et al., 2008)。与英国相反，法国对于其登记注册的企业强制要求对社会和环境保护状况进行披露 (Aaronson & Reeves, 2002)。国家和商业、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深入发展的空间 (GTZ, 2007)。

4. 希腊广场模式指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采用的方式。

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 CSR 策略尚处于早期阶段。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商业组织、贸易协会、学术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话的促进者，为社会建立对 CSR 的共识 (Albareda et al., 2008; Lozano et al., 2008)。

(三) 美国

美国有着强烈的公私合作文化，这种文化要素为企业守法和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承诺提供支持。以公私合作来促进公司自愿守规的工具已引进到联邦和州政府，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Ayres & Braithwaite, 1992; Rechtschaffen, 1998)。这些工具往往牵涉到政府和非政府团体。例如，克林顿和布什当局和不少州政府都引进类似项目以提高环保合规 (Potoski & Prakesh, 2004; Fiorino, 2009)，显著的例子包括根据环境保护局制定的环境改造行动方案，此方案引进的 40 多个自愿守规的合作项目 (Gunningham, 2008: 117 - 118)。同时，市民自发组织也不断有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私合作的成功例子 (Rogers & Weber, 2010)。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府将 CSR 角色限制在规制范围内。例如，联邦证券监管局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要求企业必须披露所有可能会影响投资者购买该公司股票的重要信息 (material information) [TSC Industries v.

Northway Inc. , 426 U. S. 438, 439 (1976) 案例]。另外, 虽然 2010 年的 Dodd - Frank 金融改革法案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最新出台的指导意见并未有强制要求企业报告可持续性或 CSR 的资料, 但这些法规现在也要求企业披露其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Dodd - Frank, 2010)。还有, 美国的国家公司法许可企业对慈善机构捐献, 税收体制也有激励的政策。像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Aaronson & Reeves, 2002), 当政府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时, 往往充当“榜样领导”, 制定“绿色”和“可持续”政府采购标准, 这些联邦标准已被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美国的其它州采纳(McBarnet, 2007: 43)。

在美国, CSR 项目通常被定义为“超越合规”。因此, 政府采用有限的角色, 放手让私人部门、健全的公民社会组织来回应投资者、顾客和非政府组织的 CSR 要求(Aaronson & Reeves, 2002; Ho, 2010; Ribstein, 2006)。虽然一些州和联邦行动方案促进或激励自愿服从或规制的指令, 但是和欧洲相比, 美国社会远远不需求并难以接受 CSR 作为明确的公共政策(Aaronson & Reeves, 2002)。

(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虽然大部分关于实现 CSR 的研究都集中在发达经济体,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政府, 包括南非、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西、埃及、智利、韩国、尼日利亚和越南, 同样也正在针对 CSR 建立相关的公共政策(Fox et al. , 2002; GTZ, 2007)。在这些国家中, 许多已支持采用新的 ISO26000 指导标准和其他国际性 CSR 标准(ISO, 2007), 同时也支持 CSR 实践, 鼓励或强制要求进行社会报告, 并且与行业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去建设公司履行“超越合规”的能力(Fox et al. , 2002; Visser, 2008; GTZ, 2007; Peters et al. , 2010; Afsharipour, 2011)。维什(Visser, 2008)关于这方面的“荟萃”研究(meta - analysis)发现, 发展中国家对 CSR 的理解与那些反映在卡罗尔的金字塔等级模式中的 CSR 相比, 毫无意外地具有不同的优先考虑次序(Carroll, 1991)。因此, 维什(Visser, 2008)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新的 CSR 金字塔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经济责任和慈善事业构成金字塔的底层, 往上是法定责任, 然后是伦理道德责任在塔的顶端。

(五) CSR 在中国的演变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不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CSR 的某些维度已在学术讨论中出现。与此同时，随着专业守则和第三方审计不断激增，CSR 的概念通过全球的供应链体系被引进到中国的公司(刘诚，2006：531；Li，2011；张彦宁、陈兰通，2007：18 - 23；Tang & Li，2009：202)。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各级政府在 CSR 中的角色及公共、商业组织对社会责任的认知都有很大的演变(陈英，2009：53 - 59；Chen，2009；Xu & Yang，2011)。

2005 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采纳“构建和谐社会”为党的战略任务，胡锦涛主席也明确地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宏伟蓝图，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支持 CSR 和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Xinhua News Agency，2006)。胡锦涛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随后的声明中都强调，商业活动不能把追逐利益凌驾于道德和广大的社会福利之上，而应该开展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商业实践(王丹，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11)。这些原则被吸纳到 2006 年的中国公司法修正案中，虽然该条款的意义仍值得探讨。该修正案规定，中国的企业“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社会道德、商业道德，并且承担社会责任”(第 5 章)(史际春等，2008；楼建波，2009)。

2006 年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围绕 CSR 的很多行动方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GTZ，2007；China - Europa Forum，2010；王丹，2010)。这些措施大部分是 CSR 指导方针，内容包括：促进企业进行自我报告和披露；关注利益相关者；环境可持续发展；遵守法律；发展慈善活动等。这些 CSR 指导方针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CSR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2008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国有企业 CSR 指导方针。中国银监会也颁布指导方针，要求大银行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核心原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另外，在 2007 年，中国银监会、国家环保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引进了“绿色金融”措施，要求上市、信贷、保险和退税遵循环境标准(中国人民银行，2007)。各政府部门也积极地与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机构一道不断促进 CSR 的发展和实施，例如，商务部已与德国、瑞典政府合作，共同促进本地的公私合作关系，并广泛倡议 CSR 的发展。

在地方层面，地方和省级政府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致力于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制定 CSR 指导方针以及通过财政刺激和直接的能力建设来激励企业守法和“超越合规”（王丹，2010；CASS，2011；GTZ，2010）。最常见的项目是引进税收激励，实施绿色信贷和绿色财政项目。地方和省级政府也通过各种各样的 CSR 奖励项目积极地促进 CSR 意识的提升。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的许多地方政府也实施了结合本地实际的 CSR 指导方针（GTZ，2010；王丹，2010）。例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开发了一个 CSR 审计模型，综合超过 60 项覆盖广大利益相关者的措施，同时又在地区经委下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和公民社会代表组成的 CSR 体系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便协调本地的 CSR 活动、提升 CSR 意识和协调 CSR 审计（王丹，2010；新华社，2007）。其目的之一是促使政府和商业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政府引导，企业自愿，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王丹，2010）。

另外，各种行业和贸易协会，包括中国国家纺织品和服装理事会（CNTAC）、中国企业联合会（CEC）、中国工业协会、中国企业社会职业联盟、中国中小企业协会（CASME）、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协会和其他地方性的协会，都为其成员建立了 CSR 报告原则（中国工业协会，2008；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2010；深圳市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联合会，2010；王丹，2010：173 - 174）。一些由国家支持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中国非政府组织合作协会、中国企业联盟、中国商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等，也在促进行业和政府间关于 CSR 的能力建设和对话，并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张彦宁、陈兰通，2007）。

四、未来的政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合规和“超越合规”

以上的讨论表明，不同国家促进 CSR 的政策和方式各异，从支持 CSR 和自愿的 CSR “软”促进，到积极地与商业及公民社会合作，甚至用传统典型的命令和控制手段的“硬”工具来促进 CSR 发展。目前各国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不足，对于这些政策和方法的影响和效果，仍需要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情况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根据已有的相关企业自愿守规、模范创立和激励建构的研究显示，各种工具互有长短，这些研究可为政府衡量如何促进 CSR 提供帮助。下述将这些相关的文献作简单介绍，并思考这些研究对中国的启发。

(一) 国家推动的 CSR：经验和挑战

虽然内在的政策目标、内部政治竞争和公共压力是政府促进 CSR 的推动力，但很多政府推动 CSR 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政府认识到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力，并且需要新的策略去激励商业减少其消极影响和增加其积极的贡献。它们认为成功的 CSR 政策，最起码能增强企业自愿遵守现有法律和管理条文的意愿。更乐观的话，CSR 将激励公司遵守企业精神，换言之，能够做到“超越”法规要求，把对环境、社会、治理和社区的影响综合考虑到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中。

国家对 CSR 的有效支持同样能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得到好处，包括通过商业和公众参与，使政策制定更具创新。CSR 政策也能鼓励公共机构越过传统的制度和权力界限，更有效地与社会互动。另外，通过为商业增加透明度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环境，CSR 也能激励企业朝合规和“超越合规”的方向作更多努力。

1. 国家作为管理者：指令式 CSR 策略

在西方的学者和实践者中，早期关于国家在 CSR 中的角色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是否应该通过法律强制要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实践这一主题 (Albareda et al., 2008: 349)。然而，当前很多评论家认为，政府一般不应强制把 CSR 原则作为正式的法律要求。相反，他们寻求通过商业和公民社会参与并依靠“软”手段来激励 CSR 实践 (Aaronson & Reeves, 2002; Lozano et al., 2008: 29; Albareda et al., 2008)。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政府把 CSR 政策看成是克服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手段的局限性的一个方式 (McBarnet, 2007: 55; Peters & Roess, 2010)。

如果政府要实施指令式 CSR 政策，就必须考虑国家机构的能力和意愿，这些因素也是传统规制方式受到限制的原因 (McAllister et al., 2010: 7-9)。这种关系在最近一份对江苏和内蒙古的关于环境披露的试点项目比较研究中，就得到了证实。该研究对两省分别采用自愿的和指令性的环境披露试点项目进行比较。发现表明，一个指令性披露项目的成功依赖于当地领导者的承诺和当地的资源，而非政府的环保组织所支持的自愿项目，能成功地影响企业活动和公众意见 (Li, 2011)。其他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Lo & Fryxell, 2005; Locke et al., 2007; van Rooji & Lo, 2010)。

很多关于公司合规行为的多学科研究也表明,对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模式的 CSR,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要调整对违规者的罚金,使其足以制止侵害,同时也要控制在违规企业的支付能力之内 (Ayres & Braithwaite, 1992; Sigler & Murphy, 1988; 1991; May, 2004; Rechtschaaffen, 1998)。如果法规要求和罚金太高,企业可能会觉得遵守规则的代价太高,对于守法的厂商而言法律可能会失去合法性,厂商也会试图避法或去影响执行当局,最后变成有法不依 (Bardach & Kagan, 1982; Sigler & Murphy, 1998; Parker, 2006)。还有,指令式的 CSR 政策存在的风险是,这些政策有可能会变成另一层法规负担,结果使其失去可执行性。

但同时,对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本身来说,强制性条例也许是促进 CSR 的最有效方式,例如,把 CSR 标准作为明确的要求附加到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当中。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办法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由于这些政策具透明性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况,如 CSR 的顾客压力、投资者需求和其他市场推动力薄弱时,尤为重要。

另外,自上而下的 CSR 在“创造一个更有助于企业自愿达成其社会责任的环境”中能扮演补充角色 (EC, 2011: 5)。政府可以颁布法律来支持公民社会组织、企业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组织等。除了主张指令式的 CSR 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颁布“荟萃”规定 (meta-regulation),整合不同的自治法规 (self-regulation),比如由公司、行业和自治组织制订的自愿 CSR 指导办法和标准 (Parker, 2002: 245 - 291)。政府也可以建立企业规范准则 (即制定企业守规的规范),为企业守法创造一个稳定可知的管理环境,当准则强制执行时为企业刑事起诉的宽恕政策和民事处罚的界限设立指导,并要求政府采购和融资时采纳定下的准则 (Murphy, 2005: 424 - 433)。

2. 政府作为支持者和促进者: 促进自愿主义和自治

关于公司合规的文献表明,激励 CSR 的措施,即使是不具约束力的,相较于具有约束力的指引有可能更有效地促进守规行为 (Fairfax, 2005)。因此,最近关于 CSR 的政府角色和成功的 CSR 政策的研究都强调国家作为 CSR 的支持者和促进者的重要性,这个角色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和宣传促进 CSR,另一方面要通过“软规则”的使用去刺激企业自愿承担责任 (Fox et al., 2002; Lozano et al., 2008;

Albareda et al., 2008; Peters & Roess, 2010)。

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建立自愿的 CSR 披露机制和让企业参与进入 CSR 为导向的项目；对“CSR 领袖”实行税收优惠、财政激励及对进行 CSR 的企业“放松管制”，比如企业如果达成 CSR 目标或实施 CSR 自愿项目可免罚款或检查。这些政策工具都强调国家当局和受其管理的企业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因为这种工具注重奖励积极的表现并且关注未来的行为，它们能够帮助企业建立守规能力并减少规制机构的负担 (Ayres & Braithwaite, 1992; May, 2004; Sigler & Murphy, 1988)。它们同样也能积极地促使企业“超越合规”行为，自愿地采用最好的管理办法 (Potoski & Prakesh, 2004)。

然而，自愿的或自治的 CSR 项目也有其局限。首先，批评者指出，这样的项目会使企业隐藏真实的记录，并给企业饰词来进行违规行为 (Potoski & Prakesh, 2004: 153)。因此，自愿的或自治的 CSR，必须在企业确信政府会有能力灵活地对待违背者，而政府也确信企业不会故意地逃避规制的情况下，才可成功 (Potoski & Prakesh, 2004)。

其次，过分地依赖自愿的 CSR 项目去激励更好的企业行为会对国家产生“置换”或“空心”效应。自愿的 CSR 方案会通过把负担转移到企业而减少国家处理众多政策问题的动机。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了说服政府不必要采取新的管理或硬性的指令，它们通常会乐于自愿承担 CSR 实践的义务 (Reich, 2009: 170, 190 - 195; Bartley, 2009: 119; Parker, 2002)。对于一些政府来说，让企业自愿守规是有强大的诱惑力，因为相对于颁布和实施“硬性”法律和管理规则的政策挑战而言，“软性”CSR 标准更容易推行 (Bartley, 2009: 117 - 119)。

对企业参与自愿 CSR 项目的研究，比如美国环保部的合规项目研究发现，这些项目对企业有轻微但可测的影响 (Fiorino, 2009: 224)。这些研究同时也注意到类似项目的成员身份有着“俱乐部利益”的特征，这样的利益来自“俱乐部”使参与者获得有别于非参与者的能力，并获得名誉和经济上的利益 (Potoski & Prakesh, 2009; Coglianese & Nash, 2009)。例如，许多公司寻求按照国际标准来设计，比如 ISO 认证，和其他非“俱乐部成员”的竞争者区别开来。但由国家主办的“俱乐部”要面临特有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必须保持高的国家标准，才可保证进入“俱乐部”的会员身份价值，同时也不能将标准定得过高，才可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来增

加项目的影响力 (Potoski & Prakesh, 2009; Coglianese & Nash, 2009)。如果政府奖励一些有良好 CSR 的公司, 但这些公司后来被发现严重违规的情况, 政府就会面临着“连带同犯”的风险 (Coglianese & Nash, 2009: 247 - 250)。因此, 自愿 CSR 的成败, 取决于项目的诚信和政府防止企业卸责的能力 (Fiorino, 2009: 228)。

最后, 自愿的或准自愿的 CSR 应视为是一个规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规制学者指出, “合作的”或“回应的”规制策略也许对一般违法行为是最好的动力, 但它们的效用取决于较少地使用威胁, 但要严厉地制裁违背者, 为规制企业树立威信 (Ayres & Braithwaite, 1992: 35 - 40)。这些理论源自最近一些对“另类规制策略”的研究, 比如在规制体系较弱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发起的自治项目和类似的自愿指引的研究 (McAllister et al., 2010; Van Rooij, 2010)。在这些国家, 公司遵守基本的环境、劳动和其他法规的意愿通常较低。正如刘本 (Benjamin van Rooij) 对哥伦比亚、菲律宾、中国和墨西哥的自愿的规制研究所述, 以市场为基础、由社会实施和自愿方法的规制的成功有赖于国家有效的监督检查能力和其他执法体制的支撑 (van Rooij, 2010)。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 政府的执法能力较弱, 以市场为基础和自愿的规制不大可能会成功, 更不可能是对付规制无效的灵丹妙药 (McAllister et al., 2010: 7; van Rooij, 2010)。

3. 国家作为伙伴: 公私合伙关系和合作的治理

在某些国家, 尤其是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以一种合作的方式直接参与到 CSR 中。这种模式强调公私合伙关系, 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在议程设置、资源提供、承担共同责任上作出贡献, 甚至建立联合的争议解决网络 (Gunningham, 2008: 118; Lozano, 2008; Ansell & Gash, 2007: 544 - 545; Albareda et al., 2008)。

“参与式”CSR 策略的动力来自对政府资源有限的认知, 并认识到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填补社会福利的空隙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上的比较优势, 也了解政府对商业及各种顾客团体利益的回应的重要性 (Gunningham, 2008: 110 - 111; Rogers & Weber, 2010)。通过和非国家行动者的合作, 政府可以利用国际标准设定经济组织、贸易伙伴、内部管理者和公民社会, 并使其成为有社会影响的重要

非正式机制(Gunningham, 2008: 115; Albareda et al., 2008)。

研究参与式 CSR 项目和其他形式的“新治理”(new governance)的西方学者指出,公私合作参与形式比传统的管理和执行办法更具优势,尤其是在解决复杂而具有大范围公共影响的政策问题时(Rogers & Weber, 2010)。这些优势包括提高政策合法性的公共认识、加强跨越传统管理界限的创新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增进自愿守法的意愿和提高商业团体对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支持(Gunningham, 2008: 118; McBarnet, 2007: 24 - 27; Rogers & Weber, 2010)。这些成功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参与者之间先前的冲突或合作历史、对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领导能力和制度设置”(Ansell & Gash, 2007: 550)。

(二)政策的集合和沟通影响

正如上述的讨论显示,没有单独的政策能独自地激励公司作出牢固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实际上,对不同法规领域的实证研究指出,当个体和企业遇到一个有多重激励措施汇集并相互补充的“网状”规制体制时,它们会显示出更高水准的规制标准,也更愿意自愿地遵守非正式的规范,并且更有意愿和管理当局合作(Gunningham, 1998; van Rooji & Lo, 2010; Lister, 2011)。因此,CSR 作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管理策略相结合的一部分,对于促进公司向“可持续性”“道德企业”或类似政策目标方向发展可能是最为有效的(Frenkel, 2001; Locke et al., 2007; van Rooji & Lo, 2010)。在这种政策结合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推动 CSR 的实践中也同等重要。

国家 CSR 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沟通效应。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和其他学者认为,规制是传达国家公共政策承诺的一种手段,对于明确的规制内容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有着强烈的间接影响(Pildes, 1991; Sunstein, 1996; Gunningham & Grabosky, 1998)。此外,当公共政策和自愿行动成为“合作型规制结合体”的一部分时,它们会相互强化并能以积极的方式相互配合(Lister, 2011; Trubek & Trubek, 2007)。在理想的情况下,国家发起的 CSR 政策将会向公司传达一个与现有规制和非国家性的 CSR 方案一致的信息来推动企业向同样的政策目标迈进。

但在现实中,许多国家促进 CSR 的另类规制工具往往产生传达混乱信息的风

险，结果破坏了 CSR 政策和现有规制的效力。首先，如果国家主导的 CSR 奖励、行动方案或项目是无效的、不透明或执行欠公平，项目本身和主管机构的合法性就会受损，政府也会被认为在愚骗百姓。另外，如果由政府主导的 CSR 指引或项目为参与者制定了一个低于法律要求的标准的话，就等于是国家发出了降低“现实”法律门槛的信号。最后，如果自愿的或非正式的项目仅仅是变成了一个新的利益竞技场，这些企业通过影响规制机构而获得的规制上的“战利品”的话 (McAllister et al., 2010: 2)，CSR 项目和国家机构的合法性都会受到损害。

因此，如果要为 CSR 政策打下一个迈向成功的基础，政府就要建立透明的、持续的和有效的规管体制。国家机关也可以通内部政策与管理来实践 CSR，例如通过国有企业、合同外包、公私合伙或是政府采购等方式来参与市场运作，以此表明国家对 CSR 的积极支持。

五、CSR 在中国情境下

上述的文献比较清晰地表明，不同国家促进 CSR 的政策和方式都各有特异。在比较线的一端，是英国采用的全面参与方式；而另一端，美国政府则只在传统的规制范围外采用间接方式促进 CSR。每个国家对 CSR 的实质关注点也不一样。因此，中国政府一样地要采用适合当地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 CSR 策略，考虑环境因素对于政策工具选择的潜在影响，相应地发展出与西方或亚洲其他地方不同的 CSR 模式。

(一) 由政府领导的革新

考虑到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激励 CSR 实践中，中国政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更能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近年来由中国各级政府发起的 CSR 项目表明，很多项目都关注于鼓励企业守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开始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 (王丹，2010；GTZ，2010；See，2009)。

(二) 文化共鸣

因与许多西方国家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环境有别，许多亚洲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经历一个传统儒家价值复兴的过程，这刚好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共鸣(Visser, 2008)。

(三) 计划经济的遗产

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相当重要，还作为国家的延伸工具，以满足广大的社会福利需求(“企业办社会”)，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同时，也仍有某些企业会把 CSR 看成是公司和市场发展的倒退和额外的负担，阻碍了企业信奉社会责任的意愿(王丹, 2010: 119)。

(四) CSR 的主流意识

对中国的商业领袖和广大公众的实证研究表明，他们都倾向于把 CSR 定义为特别的公共慈善、慈善战略和商业伦理的实践(Tang & Li, 2009)。这暗示着很多企业缺乏一个将 CSR 整合为公司核心价值的宏观视野。关于 CSR 意识的调查也发现，公众对公司真正的社会责任承诺普遍持怀疑的态度(Chen, 2009)。考虑到网络对塑造公众认知的推动力和速度的影响力，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于一些 CSR 的公众形象，必须小心谨慎，CSR 并不能替代政府对法治和道德规范的承诺与重视。

(五) 中介组织

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围绕 CSR 的合作治理的成功有赖于中介组织的出现，协助政府开发 CSR 公共政策和为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链接提供服务(Lozano et al., 2008: 175)。这类组织最初可能是由政府、商业团体或者是其他组织建立的。例如，英国、丹麦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曾带头建立了新的支撑结构或中介体系去促进 CSR 的伙伴关系；不过在这过程中，政府不一定直接指定这些新组织的结果或日常工作议程(Moon, 2004; Lozano et al., 2008: 166 - 168)。中国地方政府和主要企业的关系(Luo & Shen, 2007)也会影响社会对国家资助的中介组织的感受及其潜在的调停任务。

(六) 跨部门的伙伴关系

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政府而言,“伙伴关系”或“合作”的 CSR 策略代表着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新治理”方式,也反映了将社会责任和规制权从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重新转到非政府领域网络,例如非政府组织、自治组织、利益相关者志愿协会,甚至是企业本身(Trubek & Trubek, 2007; Gunningham, 2008; 王丹, 2010)。公私合伙关系和其他的参与式策略也使政府能够跨越界别,将相对较小的传统公共部门与广泛的私人经济(包括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相连起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合作历来是比较无规律和短期的(Tang & Li, 2009: 202 - 203),并且国家对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在中国是较强。这些发展自然地使国家在推动公私合伙关系或 CSR 政策,和选择合作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Jing, 2008; Yin & Wang, 2011)。因此,中国的 CSR 合伙关系跟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相比,会较少出现规制权的重新配置。同时,关于如何更好地划分国家和企业在提升社会福利上的责任界限问题,中国的挑战会更大。

中国的很多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都认为需要制定明确的国家政策和规则去促进 CSR。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型和对外投资企业,也意识到 CSR 能帮助建立长期商业成功的竞争优势。既然很多协助政府开发 CSR 政策构架并检验影响的工具已被确认(Peters & Roess, 2010),中国的挑战,关键在如何在“根据地方和国家的个别环境与现有的激励和能力条件下,去厘定政策优先序和激励方法”(Fox et al., 2002: 3)。

世界各国政府的深刻经验显示,传统的国家主导的规制工具和另类的自愿和自治策略能相互补充、影响甚至竞争(Trubek & Trubek, 2007; Lister, 2011: 28 - 32)。尤其是政府支持的 CSR 项目很可能会影响企业遵守法规的行为,而企业对监管部门的看法,会影响企业支持国家领导的 CSR 政策的意愿。不管这些挑战如何,在鼓励企业“超越合规”,但又不取代传统管制的公共政策的前提下,CSR 应能促进政策创新和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

考虑到在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中心角色,中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有很好的条件直接地与商业团体合作去促进 CSR。中国的经验,必能为尚处于发展中的对比视角下的 CSR 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 陈英主编 (2009).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现.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 胡鸿高 (2009). 企业社会责任: 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 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企业社会责任转轮》.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黎友焕 (2010). 企业社会责任.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刘诚 (2006). “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中外法学, 18(5).
- 楼建波 (2009). 中国《公司法》第五条一款的文义解释及其实施路径. 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企业社会责任转轮》.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上海证券交易所 (SSE) (2008). 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5月14日.
- 深圳市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联合会 (SREA) (2010). 深圳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6月22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 (SZE) (2006). 深圳证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参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d31bb3c76137ee06eff91810.html>.
- 史际春、肖竹、冯辉 (2008). 论公司社会责任: 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 王丹编 (2010). 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新华社 (2007). 上海浦东: 启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 8月15日.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5/content_6534454.htm.
- 张彦宁、陈兰通编 (2007).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 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 (GTZ) (2010). 中国地方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政策分析. 参见: <http://www.chinacsrproject.org>.
-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CICA) (2010).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参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e91e57d9ce2f0066f5332218.html>.
- 中国工业协会 (CIA) (2008).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 4月2日. 参见: <http://www.csr-china.net>.
- 中国人民银行 (2007).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银发[2007]215号, 6月29日. 参见: http://www.gov.cn/zwgk/2007-07/06/content_675200.htm.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11). 2010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报告. 参见: www.syntax.com.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CBRC) (2008). 银监会推动大型银行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1月15日. 参见: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16.html>.

- 朱慈蘊 (2009). 公司的社会责任: 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规范之间. 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企业社会责任转轮》.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aronson, S. & Reeves, J. (2002). *The European Response to Public Demands for Glob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Policy Association.
- Afsharipour, A. (2011). Directors as Trustees of the Nation? India'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form Efforts.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4: 995 – 1024.
- Albareda, L. , Lozano, J. , Tencati, A. , Midttun, A. & Perrini, F. (2008). The Changing Role of Governments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rivers & Responses.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17(4) : 347 – 363.
- Ansell, C. & Gash, A. (2007).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 543 – 571.
- Ayres, I. & Braithwaite, J. (1992). *Responsive Regulation: 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dach, E. & Kagan, R. (1982). *Going by the Book: 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artley, T. (2009). Standards for Sweatshop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the Club Approach to Voluntary Labor Standards. In Potoski, M. & Prakesh, A. Eds. *Voluntary Programs: A Club The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IT Press.
- Bhagwati, J. (2004).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npain, R. , Bisom – Rapp, S. , Corbett, W. , Josephs, H. & Zimmer, M. Eds. (2007). *The Global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A. B. (1991).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Business Horizons*, July – Aug. : 39 – 48.
- Chen, X. (2009). *CSR in China: Consciousness and Challenges – A Study Based on Zhejiang Province*.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US – China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Apr. 15th – 17th.
- China – Europa Forum (2010). *CSR Frameworks i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sights for CSR Workshops*.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bdfdoc-1704_en.html.
- Clark, G. L. & Knight, E. R. (2009). Implications of the U. K. Companies Act 2006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 Employment Law, 11: 259 – 296.

- Coglianesi, C. & Nash, J. (2009). Government Club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 In Potoski, M. & Prakesh, A. Eds. *Voluntary Programs: A Club The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rane, A., McWilliams, A., Matten, D., Moon, J. & Siegel, D. Eds. (200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dd – Frank (2010).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Pub. L. No. 111 – 203, 124 Stat. 1376.
-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01). *Green Paper – Promoting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 366 – final. Brussels, July 18th.
-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02). Communic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Busines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 347 – final. Brussels.
-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11). Communication: A renewed EU strategy 2011 – 14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 681 – final. Brussels, Oct. 25. Available on line: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policies/sustainable-busines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index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 General for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2006). *Communication: Implementing the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Jobs: Making Europe a Pole of Excellenc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 136 – final. Brussels, Mar. 22.
- European Multi – Stakeholder Forum on CSR (EMSF) (2004). *Final Report, Final Results & Recommendations*. Brussels, June 29th. Available on line: circa.europa.eu.
- Fairfax, L. M. (2005). The Rhetoric of Corporate Law: The Impact of Stakeholder Rhetoric on Corporate Norms.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31: 676 – 718.
- Fox, T., Ward, H. & Howard, B. (2002). *Public Sector Roles in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Baseline Study*. Washington: World Bank.
- Fiorino, D. J. (2009). Green Clubs: A New Tool for Government? In Potoski, M. & Prakesh, A. Eds. *Voluntary Programs: A Club The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rederick, W. C. (200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ep Roots. In Crane,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nkel, S. J. (2001). Globalization, Athletic Footwear Commodity Chai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China. *Organization Studies*, 22(4): 531 – 562.

- GTZ & Stiftung B. (2007). *The CSR Navigator: Public Policies in Africa, the Americas, Asia and Europe: Summary Report*.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
- Gunningham, N. (2008).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non-State Law. In Schooten, H. & Verschuuren, J. Ed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aw: State Regulation and Non-state Law*. Edward Elgar: Northampton.
- Gunningham, N. & Grabosky, P. (1998). *Smart Regulation, Design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 V. H. (2010). Enlightened Shareholder Value: Corporate Governance Beyond the Shareholder – Stakeholder Divid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36(1): 59 – 112.
- Jing, Y. & Chen, B. (2011). *Is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for Social Services Competitive? A Case Study of Restructuring Government – Nonprofit Relations in Shangha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Shanghai, June 17th.
- Li, W. (2011). Self – Motivated versus Forced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China: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Pilot Disclosure Programmes. *China Quarterly*, 206: 331 – 351.
- Lister, J. (201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tate*. Vancouver: UBC Press.
- Lo, C. W. H. & Fryxell, G. E. (2005). Governmental and Societal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Guangzho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1: 558 – 588.
- Locke, R. M., Qin, F. & Brause, A. (2007). Does Monitoring Improve Labor Standards? Lessons from Nik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1(1): 3 – 31.
- Lozano, J. M., Albareda, L. & Ysa, T. (2008).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blic Policies Beyond Regulation and Voluntary Compli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uo, X. & Shen, J. (2007). Urban Governance in Cross – border Coalitions: The Case of the Jiang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Jingjiang,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9(3): 353 – 377.
- May, P. J. (2004). Compliance Motivations: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Biases. *Law & Society Review*, 38: 41 – 67.
- McAllister, L., Van Rooij, B. & Kagan, R. (2010). Reorienting Regulation: Pollution Enforcement in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Law & Policy*, 32(1): 1 – 13.
- McBarnet, D. (200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Law, Through Law, For Law: the New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McBarnet, D., Voiculescu, A. & Campbell, T. Eds. *The New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n, J. (2004). Government as a Drive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CCSR Res. Paper Series, No. 20.
- Moon, J., Kang, N. & Gond, J. (201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ment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east Asia from a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Perspective*. ICCSR Res. Paper Series, No. 56.
- Mullerat, R. (201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 Murphy, S. (2005). Tak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to the Next Level.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3: 389 – 433.
- Parker, C. (2002) *The Open Corporation: Effective Self – Regula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ker, C. (2006). The “Compliance” Trap: The Moral Message in Responsive Regulatory Enforcement. *Law & Society Review*, 40: 591 – 619.
- Peters, A. & Roess, D. (2010).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Promoting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in Development*. UN Global Compact & Bertelsmann Stiftung, June.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docs/news_events/8.1/UNGC_Bertelsmannn.pdf.
- Pildes, R. H. (1991). The Unintende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Public Policy: A Comment on the Symposium. *Michigan Law Review*, 89: 936 – 978.
- Potoski, M. & Prakesh, A. Eds. (2009). *Voluntary Programs: A Club Theo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otoski, M. & Prakesh, A. (2004). The Regul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4(2): 152 – 163.
- Rechtschaffen, C. (1998). Deterrence vs.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ving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South Carolina Law Review*, 71: 1181 – 1272.
- Reich, R. (2009). *Super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 Ribstein, L. E. (2006).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Notre Dame Law Review*, 81(4): 1432 – 1493.
- Rogers, E. & Weber, E. (2010). Thinking Harder About Outcome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0(5): 546 – 567.
-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2010). Commission Guidance Regarding Disclosure Related

- to Climate Change.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33 - 9106, 75 Fed. Reg. 6292.
- See, G. K. H. (2009). Harmonious Society and Chinese CSR: Is There Really a Link?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9 (1): 1 - 22.
- Sigler, J. A. & Murphy, J. E. (1988). *Interactive Corporate Compliance: An Alternative to Regulatory Compulsion*. New York: Quorum Books.
- Sigler, J. A. & Murphy, J. E. (1991). *Corporate Lawbreaking and Interactive Compliance: Resolving the Regulation - Deregulation Dichotomy*. New York: Quorum Books.
- Steurer, R. (2007).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 Proceedings. Report of the 5th meeting of the ISO Working Group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Vienna, Nov. 3rd.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sustainability.eu/pdf/Proceedings_ISO - Gov - Seminar_ printversion_ pics. pdf](http://www.sustainability.eu/pdf/Proceedings_ISO-Gov-Seminar_printversion_pics.pdf).
- Sunstein, C. R. (1996). 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44: 2021 - 2053.
- Tang, L. & Li, H. (200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and Glob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 199 - 212.
- Trubek, D. & Trubek, L. (2007). New Govern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Complementarity, Rivalry & Transform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13: 539 - 564.
- Van Rooij, B. (2010). Greening Industry Without Enforcement? 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Bank's Pollution Regulation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aw and Policy*, 32(1): 127 - 152.
- Van Rooij, B. & Lo, C. W. H. (2010). Fragile Convergence: 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the Enforc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lution Law. *Law and Policy*, 32(1): 14 - 37.
- Verdier, P. (2009). Transnational Regulatory Networks and Their Limit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4: 114 - 172.
- Visser, W. (200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iegel, D. , Moon, J. , Matten, D. , McWilliams, A. & Crane, 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C. A. (1999).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Transparency. *Harvard Law Review*, 112: 1197 - 1311.
- Williams, C. A. & Conley, J. M. (2005). An Emerging Third Way? The Erosion of the Anglo - American Shareholder Value Construct.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8: 493 - 551.
- Xinhua News Agency (2006). *China Publishes its Resolution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 15. Available on line; <http://>